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 秦汉史论丛

宋 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宋 超/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史论丛/宋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ISBN 978-7-5004-9853-7

I. ①秦… II. ①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汉时代  
IV. ①K232.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8688 号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35798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65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高 翔**

**副主任 王利民 余新华**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利民 王兆胜 孙 魏 李红岩 余新华**

**范勇鹏 柯锦华 姚玉民 祝晓风 高 翔**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序

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社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创刊）迎来创刊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创刊）创刊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诸同仁精选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汇集成这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科研人员呈现给自己单位的一份深情厚礼。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始终坚持“编研结合”的方针，要求编辑人员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认真研究理论和学术问题，既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前沿，又要准确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历史；既要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理念、研究风格和独到见解。正是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学术风气、深厚的学术积淀，使杂志社不同于一般的编辑机构，它拥有一支具有较深理论造诣和学术积累的科研队伍，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学术报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在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洪流中，占有醒目而且重要的位置。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关心和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对理论学术前沿的研究和引领，率先在全国期刊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建立了理论前沿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完善采、编、发流程管理，大力实施“开门办刊”和“开门办报”方针，更加强调“编研一体化”，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专家型编辑、记者，努力为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这套学术文库，可以说是对杂志社编

研结合办社方针成果的一次检阅。

尽管这部学术文库所收论著，既有离退休老同志的论文辑录，也有在职同志的自选集，还有青年同志的学术专论，但毕竟只是部分同仁的科研成果，未必代表杂志社工作人员的最高学术水平。当然，从其所涉领域、研究理路、学术风格中，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杂志社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科研特色。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异常艰辛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经受挫折、百折不回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要成绩的。好在中国学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无论是从事编辑工作，还是从事科研工作，只要认真反思、体会、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就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教益。

一是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的传统。真正的学问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实上，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二是求真的传统。学术研究，就其直接目的而言，就是揭示和研究人类活动的各种形态。这决定了它必须将具体的事实在自己学术立论的重要基础。明儒王阳明曾提出“五经亦史”的重要论断，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言未必准确，但反映了中国学术注重事实、不空言义理的重要传统。学术的科学性，首先取决于研究者是不是在依靠事实说话。事实的论证，要永远重于空洞的说教。

三是经世的传统。这就是主张学术研究要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学术从来都以经世为其基本目的。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以史经世的学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这就是说，注意人伦日用，关注时代需要，是章学诚治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以史经世的基本内容。正是经世的传统使史学在中国历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环顾当今学林，中学与西学互动，传统与现代并存。然而，我们民族悠久、深远的优秀学术传统，仍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库。学术研究如果不以求是为目的，如果不关注、不探索社会演变的规律，以烦琐考证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玑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赅全，见小遗大，学术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在由无数具体事实堆积而成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一旦如此，其着力愈多，其离科学精神所追求的境界愈远。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缺乏对规范的必要尊重，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学术也会丧失自己的精神境界，堕落为“玄学”。就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如果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简单对立，学术将不但会丧失发展的余地，而且也会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反之，如果将经世致用简单化、庸俗化，用应时之作取代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探索，学术就会堕落为“俗学”，也谈不上起码的尊严。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学术也是如此。如何立基，何去何从，是每一个治学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岂可不深思而慎择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付梓之际，聊草数言，权充书序。

高 翔

2010年4月于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院

# 目 录

## 秦人与匈奴关系考察

- 以汉人“过秦”言论为中心 ..... (1)  
秦直道与汉匈战争 ..... (16)  
秦汉时期北河战略地位考察 ..... (27)  
“癰疥之疾”与“心腹之患”

- 南越匈奴与秦汉王朝关系比较研究 ..... (39)  
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 ..... (53)

## “匈奴人”与“胡虏”:两汉时期匈奴称谓变化考察

- 以居延汉简为中心的讨论 ..... (70)  
西汉时期燕国与匈奴关系考略 ..... (89)  
汉匈战争与北边郡守尉 ..... (100)  
齐人延年决河出“胡中”考略 ..... (111)  
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 ..... (121)  
“乐府诗”中所反映的汉匈战争 ..... (130)  
两汉之际汉匈关系考略

- 以江统《徙戎论》为中心 ..... (144)  
明人眼中的汉匈战争  
——以河套之议为中心的讨论 ..... (159)

- 蒙恬再评价 ..... (173)

## 汉文帝与代臣

- 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 (187)

---

“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	
——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	(200)
“五陵”与“五陵少年”	
——以诗赋为中心的考察	(211)
东汉末年中原士民徙居扬荆交三州考	
——兼论永嘉迁徙前客家先民的早期形态	(223)
刘表与荆州	(237)
“南北纷争，以南阳为孔道”	
——东汉末年南阳战略地位考察	(249)
长江三峡与“跨有荆、益”	
——魏晋时期三峡战略地位考察	(261)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再评议	(276)
《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	
——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	(288)
从《史》、《汉》《货殖传》看两汉义利观的演变	(300)
试述我国古代重农轻工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	(312)
战国秦汉时期抑工商思想变化初探	(323)
战国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演变	(334)
战国秦汉时期炎帝传说的演变	(349)
战国秦汉时期女娲“圣王”形象的演变	(361)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丘”与“里”	(372)
走马楼吴简中的“丘”与“里”再探讨	(384)
吴简所见“何黑钱”、“僦钱”与“地僦钱”考	(399)
三台郪江崖墓“狗咬耗子”图像再解读	(411)
“羱羊”与“红羊”	
——基于阴山岩画及文献对北山羊的考察	(421)

# 秦人与匈奴关系考察

——以汉人“过秦”言论为中心

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到秦王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一个曾经幻想传之万世、金城永固的帝国不过二世就灰飞烟灭，为继秦而立的汉人留下了无尽的“过秦”话题。在汉人对秦政诸多指摘中，秦始皇修筑长城与攻逐匈奴，无疑是秦政中最为失败的一笔。<sup>①</sup>然而，汉王朝自初立伊始，既面临着匈奴侵掠的困扰，其时间之长久，程度之深重，远较秦时为剧。鉴于这一历史背景，在汉人“过秦”的主流议论中，也不时杂糅着若干“是秦”之说。细绎其中之差异，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秦人与匈奴之关系及其政策之得失。

## —

对于秦朝的诸多失政，包括对匈奴的政策在内，自秦朝灭亡后就成为汉人议论的热点之一。陆贾奉高祖刘邦之命检讨“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时认为：

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

---

<sup>①</sup> 对秦政的批评，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近期王和、陈苏镇诸先生又有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参见王和《猛士的乐土》第1章“绪论——千秋功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1章“西汉再建帝业的道路——儒术兴起的历史背景”等相关章节（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2001年版）。由于本文主要是探讨汉人对秦人匈奴政策的批评，所以于汉人对秦政其他方面的批评基本没有涉及，这是需要说明之处。

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为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sup>①</sup>

自陆贾发其端，西汉初期许多政论家、思想家，无不视秦始皇筑长城、伐匈奴为秦朝灭亡重要原因之一。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中曰：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sup>②</sup>

晁错在对答文帝诏问，为防御匈奴上“守边备塞”之策时也说：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而攻南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sup>③</sup>

《淮南子·人间训》认为秦朝灭亡之祸，其一就在于筑长城、攻伐匈奴：

<sup>①</sup>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无为第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页。

<sup>②</sup> 《史记》卷48《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63—1964页。

<sup>③</sup> 《汉书》卷49《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3—2284页。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sup>①</sup>

武帝时主父偃上书言政事，“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

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饟，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sup>②</sup>

太史公司马迁则就亲身所行蒙恬督修的长城、直道感叹曰：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sup>③</sup>

显而易见，在汉人诸多的“过秦”言论中，强调以秦政为鉴，提倡“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避免重蹈亡秦覆辙，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中似乎也反映出当时的许多人，包括像陆贾、贾谊、晁错这样的有识之士在内，对于秦始皇决策修筑长城，出兵攻逐匈奴的必要性尚缺乏全面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的产生，从秦人与匈奴的关系方面考察，表明至少在汉人的眼中，是时匈奴并没有对秦帝国产生实质性的威胁，秦始皇的行为无异于“举措暴众”、“贪戾而欲广大”，甚至是信图讎而击胡，利宝物而征粤的荒唐之举。<sup>④</sup>

<sup>①</sup> 《淮南子·人间训》。

<sup>②</sup> 《史记》卷 112《主父偃列传》，第 2954 页。

<sup>③</sup> 《史记》卷 88《蒙恬列传》，第 2570 页。

<sup>④</sup>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亦云：“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可见持此种观点的在汉人中甚众。

备受汉人指摘的秦修筑长城，攻逐匈奴（包括征服南越）之举，尽管是秦统一之后消耗国力最巨的举措，也是造成秦朝遽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从秦人的角度考察，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秦廷君臣的特别关注。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攻逐匈奴后，曾在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再次东巡，刻石会稽，昭扬功德，在这篇成文最晚，也是《史记》所载六篇刻石中最为完整的刻辞，其中也没有涉猎这方面的内容，通篇强调的仍是秦统一六国的赫赫功勋：

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会稽刻石”的宗旨，与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 218 年）尚未攻逐匈奴时的“之罘刻石”所宣扬的“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燁旁达，莫不宾服”<sup>①</sup> 的精神完全一致。

秦廷君臣所以持如此观点，是与秦统一后所面临的形势密切相关。秦的统一只是大规模兼并战争的结束，而更为棘手的制度规划、弹压六国遗民反抗等任务，则是秦廷君臣关注的焦点。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的六次巡行中，除二十七年（公元前 220 年）巡行陇西、北地，是在秦国故地外，其余五次巡行无不是针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而发，其目的正如秦二世胡亥所云：“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而防范活动于帝国北境的匈奴，尚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sup>②</sup>

再从《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统一后两次重要朝议的结果来看：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将丞相绾等请立诸子为王的奏言下群臣议，最终采纳廷尉李斯“皆为郡县”，“置诸侯不便”的建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

<sup>①</sup> 均见《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第 261—262、249 页。

<sup>②</sup> 参见拙作《秦汉时期北河战略地位考察》，《秦汉文化比较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 2001 年版。

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三十三年，秦始皇又下群臣议博士淳于越“师古”之说，复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前者为帝国划定单一的郡县体制，整齐因诸国分立而混乱不一的各项制度；后者则确定“以法治国”、“以吏为师”的帝国统治思想。尽管秦始皇被时人认定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而群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但在涉及帝国的政体制度、统治思想等重大问题时，朝臣的议政无疑对秦始皇的决策也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秦始皇决意修筑长城、直道，起兵攻逐匈奴（包括南越）时，对于秦统一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征发行动，从现存的史料看，秦始皇似乎没有下群臣议，群臣也没有发表过意见。汉人主父偃于武帝时上书言政事，“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曾引李斯谏阻秦始皇攻逐匈奴语曰：“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利，遇其民不可役而守。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此语是否真的出于李斯之口，后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史记会注考证》卷112《主父偃列传》“考证”引吕祖谦语：“李斯方助始皇为虐，必无此谏。”徐孚远则曰：“李斯谏伐胡，本传不载，非实事也。意者欲沮蒙恬之功，故为正言邪？”但是，从秦人早就认定的帝国疆域的“四至”范围而言，“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人出兵攻逐是时已经渡河而南，且活动于河南地的匈奴人，征服自立于岭南的粤人，应是秦人已定的国策，只不过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方将之付诸实践而已。<sup>①</sup>因此，不论李斯是否有此谏言，秦始皇出兵攻逐征服北胡南越势在必行；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李斯“必无此谏”，亦在情理之中。但这与李斯“方助始皇为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可见，汉人普遍认定导致秦亡原因之一的南攻北伐、筑城修道的

<sup>①</sup> 参见拙作《“癰疥之疾”与“心腹之患”——南越匈奴与秦汉王朝关系比较研究》，《佗城开基客安家——赵佗龙川建县2212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

行为，从秦人角度考察，不过是在攻灭六国之后，继续扫荡“六合之中”尚未“宾服”者行动的延续，秦廷君臣没有为此引发重大的争议，曾详细记录统一后秦廷两次重要朝议结果的司马迁，也没有在《史记》纪、传中留下相应的记录，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 —

汉时许多“过秦”论者，所以对秦始皇的匈奴政策进行猛烈抨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或是认定秦统一之后耗费巨大的国力筑城逐胡，并为之付出惨重代价，完全是秦始皇“贪戾而欲广大”的性格所致；或是对秦始皇如此举动表示不解与困惑，所谓因图谶“亡秦者胡也”而击匈奴，就是出于这样不解与困惑，并试图以此阐释始皇的行为。换言之，秦始皇究竟有无必要对匈奴采取如此强硬之措施，这是汉人在“过秦”中试图回答，并且坚决予以否定的一个重要问题。

秦人与匈奴的关系，从现存的史料考察，确实没有发现是时匈奴直接威胁秦帝国安全的记载，汉人纷纷指摘秦人的匈奴政策，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事实上，秦人对匈奴的政策，最初也是建立在防范基础上：这不仅与秦人对帝国境域“四至”的理解相关，也与是时匈奴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的安全相关。但是，匈奴人活动于毗邻秦都咸阳河南地的事实，却是秦人不能不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尽管如此，秦人在统一之前并没有对游牧于河南地的匈奴人采取攻势，<sup>①</sup>是与秦人始终坚持的“东略”的立国策略紧密相关的。

秦国立国于西陲所谓戎狄之间，从始为诸侯时起，就是以武力作为开疆拓土的手段。“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秦人正是利用周平王这一口惠无实的允诺，开始了以武力建国的道路。至秦穆公（公元前 659—前 621 年在位）时，东攻强晋，“是时秦地东到至河”；西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

---

<sup>①</sup> 春秋时活动于秦国北境的游牧族的成分相当复杂，被统称为“胡貉”，而匈奴是时尚未兴起。匈奴兴起于何时，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但至晚到战国末期，匈奴开始发迹则是事实（参见吴荣曾先生《战国胡貉考》，收入《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千里，遂霸西戎”，<sup>①</sup> 经过多年的武力开拓，终于从周旋于戎狄之间的蕞尔小国，一跃成为临河而立，可与东方诸国争胜决雄的西陲大国。

秦人这一由西向东发展的态势，从秦都邑迁徙的动向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从秦人最初都邑西陲，到秦孝王最终定都咸阳，尽管秦都城有九、八、七、六诸说，但基本分布形势是由西渐东的。<sup>②</sup> 秦人定都咸阳，东境推至西河，问鼎中原的形势已经形成，诚如商鞅对秦孝王所云：“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sup>③</sup> 对于秦人这一段以武力“东略”的历史，王遽常先生曾以情文并茂的语言予以精彩的描绘：

秦崛兴西陲，千余年间，浸炽浸昌，由西极东，其国势乃如蛟龙之起陆。初结蟠于深山大泽，禽兽之与伍，戎狄之与居，渐宛伸于陇阪之间……其后平戎至岐，横有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势如得风云，走雷电，骧然伸首，衡虑中原，则襄公始受岐、酆，文公卜居汧渭是已。及夫献、孝以来，如应龙附翼，殆欲天飞，则献公迁栎，孝公迁咸阳，实为翦除六国，混一华夏是也。<sup>④</sup>

尽管秦人的总体战略目标是“翦除六国，混一华夏”，但对来自其北境游牧民族的威胁也不是完全没有防范的意识。尤其在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胡服骑射”，改革军事制度，势力一度强盛之后，更是引起了秦人对其北境安全的关注。

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为说服群臣时曾表示：

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

<sup>①</sup> 均见《史记》卷5《秦本纪》。所谓“秦地东至河”，“正义”曰：“晋河西八城入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所谓“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正义”引“韩安国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国十四，辟地千里’，陇西、北地郡是也。”

<sup>②</sup> 关于秦都城的研究，可参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第2章《秦都城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25页。

<sup>③</sup>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2页。

<sup>④</sup> 王遽常：《秦史》卷11《郡邑考·都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sup>①</sup>

攻略位于赵国腹心地区的中山国，及位于其西北的北河地区，<sup>②</sup>是赵国实行这一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略中山地，到宁葭；西略胡地，到榆中”。赵武灵王不遗余力地向北河地区扩张，“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正是为了实现“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这一战略目的。<sup>③</sup>因此，赵国不惜代价筑长城，“自代并阴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sup>④</sup>赵长城将整个北河地区囊括其中，而北河地区远离赵国政治重心所在的邯郸，可见除了对匈奴的防范外，从西东两个方向加强对秦国的压迫，也是赵国经营北河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目的。

正由于秦都咸阳位于北河正南方向，对于可能来自北境的游牧民族及赵国威胁的反应更为敏感。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秦国占据魏国上郡，将秦国北境推进至北河地区，表明对北河地区防御的重视。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sup>⑤</sup>秦国是时所筑“拒胡”的长城，北起今内蒙古托克托，西至今甘肃岷县，贯穿上郡、北地、陇西三郡，对于秦政治重心所在内史郡是一道有效的屏障。但从秦长城由西而北的走向看，仅其长城北端深入北河地区，其中段与西

<sup>①</sup> 《史记》卷43《赵世家》，第1809页。

<sup>②</sup> 北河，“清以前黄河自今内蒙古磴口县以下，分为南北二支，北支约当今乌加河，时为黄河正流，对南支而言，称为北河”（《辞海》（缩印本）“北河”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2页）。此处所云为狭义“北河”。而广义“北河”如同谭其骧先生《北河》一文所云：“黄河自宁夏北流过磴口而东流，西东流向一段对南北流向一段而言，彼为‘西河’，此为‘北河’，是为广义。”（《长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sup>③</sup> 《史记》卷43《赵世家》，第1812页。

<sup>④</sup>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关于赵武灵王修筑长城的时间，张维华先生认为：“（司马）迁述武灵筑长城事，未有确定之年代。按《史记》卷43《赵世家》之记载，武灵王十九年定易服之议，二十年略‘胡’，至榆中，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九原、云中之经营，当武灵二十五、六年之际，似已略有规模，则武灵长城之建立，必在二十五、六年之后，盖可知矣。”（张维华：《赵长城》，收入《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103页）从张先生考订赵灵王长城修筑的时间看，更能证实赵修长城之目的是兼有防范匈奴与压迫秦人的双重目的，而且后一个目的更为重要。

<sup>⑤</sup>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47页。